

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移民实边” 政策制定的依据*

崔利波

(辽宁大学 出版社,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 民国时期, 关内人口持续增长, 农民负担日益沉重, 加之战乱有增无减,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从而形成了一股关内人口向东北迁移的流民潮。同时, 日、俄出于侵略中国的目的, 采取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措施。面对内忧外患, 东北地方政府采取了“移民实边”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这一政策具有民族性、历史性、时代性和进步性。

关键词: 民国时期; 东北地方政府; 流民; 日俄移民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08)03-0095-06

将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实行的移民政策提高到“移民实边”的战略高度, 不仅从移民政策的实际效果看是应予以肯定的, 而且从这一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也可以窥见到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和战略意识的民族性、历史性、时代性和进步性, 还可以发现它的战略来源是历史的, 是时代的, 也是理性的。

一、民国流民潮的产生及其流向

民国初年, 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是产生难民的最大源头。难民为了生活开始离村流动, 变成流民。多数流民朝着一个方向迁移, 即形成了自发移民潮, 也可以称之为流民潮。流民潮水般迁移, 主要是民国的成立并没有消除晚清时代产生难民的原因, 即(1)关内人口继续增长;(2)农民负担日益沉重;(3)战乱有增无减;(4)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此时的东北和华北相比人口密度相对较小, 战争相对较少, 对于华北缺地少食的农民来说, 东北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避难的天堂”。

(一) 民国流民潮继续的原因。辛亥革命后, 导致农民背井离乡的上述原因非但没有任何缓解, 反而有加重的趋向。

1. 外国资本的侵入使自然经济解体加速。一方面, 列强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 使中国农村的手

工业受到严重冲击, 农民原有的收入渠道被堵塞。洋货仅缴纳 2.5% 的子口税, 而中国农民的手工业品则“逢关纳税, 遇卡完厘”^{[1](P545)}, 因此根本无法与“洋货”竞争, 致使中国农村出现众多失业者和剩余劳动力。

2. 土地兼并之风有增无减。民国初年, 军阀依仗其特殊的地位, 大肆兼并土地。“民国 5 年(1916 年)张作霖强制开放达尔汉亲王旗辽河南北的沃土 4 000 余方(一方等于 45 垧), 张作霖及其岳母王花太太、鲍贵卿、冯麟阁等分割了千余方。民国 11 年, 张作霖占有通辽以西沃土 2 800 余方。民国 13 年, 吴俊升强制博多勒噶台旗租借斯卜海的土地 2 000 垧, 租期 99 年, 强迫租借博旗阿林塔拉的最好耕地 5 000 垧。”^{[2](P463)} 土地兼并的恶果是农民失去土地, “自发移民”潮也就在土地兼并狂潮之中产生了。

3. 赋税之重甚于晚清。民国初年, 据全国 22 个省的田赋地价的平均百分率统计, 水田 1912 年是 1.69, 1931 年是 2.08; 平原旱地 1912 年是 1.80, 1931 年是 2.33; 山坡旱地 1912 年是 1.99, 1931 年是 2.48^{[3](P140)}。除此之外, 田赋之附加税名目繁多, 河北有 48 种, 河南有 42 种。20 世纪 30

* 收稿日期: 2008-02-26

作者简介: 崔利波, 男, 辽宁沈阳人, 辽宁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年代,全国田赋附加税名目共计 673 种。〔4〕(P312) 农民无力缴纳租税,被迫借高利贷。农民借贷,如到期不能偿还,或者以土地、财产作抵押,或以人身为抵押,或以人口典当。沉重的高利贷迫使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4. 天灾频仍。民国成立至 20 世纪 30 年代,“各种灾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4〕(P80)。1928 年,华北发生旱荒。华洋义赈会在致纽约电中说:“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四分之一。其中三百万已赴外省就食,或在省内寻觅生路,二百万在家忍饿,所余之五百万,则以草根树叶等充饥。”〔5〕

5. 军阀混战,匪盗猖獗。据王寅生统计。1912 年~1930 年中发生战争的省份数目为:1912 年 1 个、1913 年 6 个、1916 年 9 个、1918 年 9 个、1920 年 7 个、1921 年 7 个、1922 年 10 个、1924 年 8 个、1925 年 13 个、1926 年 15 个、1927 年 14 个、1928 年 16 个、1929 年 14 个、1930 年 10 个〔6〕(P8)。凡历经兵灾之地,遍地烽火,闾里为墟,满目疮痍。“民间一切金钱、粮食、牲畜、农具”,“凡民众所有,扫数被搜去”,致使“赤地数百里,除残瓦破垣外无别物。其它人口、牲畜死伤狼藉”。战区人民不堪忍受战争之浩劫,纷纷抛弃田地家宅,四处流散。战争频仍之外,民国初年土匪猖獗,农民不堪匪累,只好弃地丢家,另谋生路。

总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外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加之军阀、官僚、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农民被迫变成了难民,不得不离开故土另寻异地求生。

(二) 民国流民潮的流向特点。大量离开故土的农民,虽有被外界经济利益所吸引的成分,但主要原因则是受经济贫困、天灾人祸所逼迫的结果。农民离村多以养家糊口为目的。当时,华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大致沿袭一定的规律:一是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流动;二是由人口密集地区向人口稀疏的地区流动;三是由战乱、天灾频仍地区向相对天灾人祸较少的地区流动;四是向邻近地区流动〔7〕(P135)。就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言,农民离村主要有 3 大流向。

1. 涌向城市。在农村普遍凋敝的民国初年,

对农民最有吸引力的是生活环境相对安定、就业机会比较多的城市。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央农业实验所曾对华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做过调查。据调查结果统计,华北农民离开故土后,在流向城市的农民中,举家迁向城市和青年男女离村的农户,河北为 63.8%、52.2%,山东为 54.2%、47.9%,河南为 59.4%、42.0%。

2. 流向邻村。相当多的单身农民在邻近的村庄间流动,或到邻近乡村做长短工、日月工,或随季节变化春来冬去,求雇耕种。农民在村间流动的原因,一是既可以节省路费,又可以兼顾家庭,属于半离村状态。二是因天灾、战乱等原因,部分地主、官僚将无主、弃耕的土地掠为己有,然后收纳逃荒农民为其开垦荒田。三是华北地主盛行不愿雇本村人的风俗,“一般人多不喜欢雇佣本村人,而喜欢外村人”〔8〕。

3. 远徙边疆。中原离家农民远徙边疆,是近代中国农民空间流动的一大特点。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压力流动律造成的。人口高压区农民流向人口低压区或负压区,这在人口学上被称为“人口压力流动律”。由于中原地区开发较早,人口密集,而边疆地区开发较迟,人口稀疏,离村农民难以寻找谋生手段,而自发地向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分流。例如,内蒙地区“中国内地的移民犹若水之就下,他们避开不利的牧场,流向比较自由的环境和容易获得土地的邻近蒙旗地带”。

二、“闯关东”大潮的特征及对东北地方的冲击

自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在向边疆迁移的大潮中,“闯关东”潮最为“波澜壮阔”,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流向之集中的程度,都在他股流民潮之上。这一流民潮具有以下时空特征:

(一) 从时间上看,流民人数呈匀加速上升态势。从表 1 中可以看出,1912 年~1929 年关内流入东三省的人数基本上是呈匀加速上升态势。而从 1927 年开始,流入东北的人数猛增,是前一年的 2 倍。当时的报刊描述流民进入东北的情形:“络绎于途,势如泉涌,南满铁路以及吉长铁路搭载之旅客数目,剧烈增长,殊为空前未有之现象。”〔9〕到 1928 年,流入东北三省的人数达到最高峰,是 1912 年的 4.3 倍。

表1 民国时期“闯关东”人数统计表

年份	流入人数(万人)	年份	流入人数(万人)
1912	25.2	1922	36.8
1913	26.0	1924	38.4
1914	27.2	1925	47.2
1915	28.0	1926	56.6
1917	30.4	1927	105.0
1919	33.0	1928	108.9
1920	33.6	1929	104.6
1921	36.2	1930	74.8

(二)从来源上分析,流民大多来源于华北各省,尤以山东为最。从地域上看,民国时期流入东北的人口大多来源于华北各省,以山东、河北、河南籍人居多,其中又以山东为最。整个民国时期,山东省籍流入东北的人数达1 836万多人^[10](P51),其规模之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据满铁会社调查,1927年山东籍人流入东北的数量达71.6万人,占当年流入东北人口总数的87.2%;1928年有所下降,但仍占流入人口总数的86.3%。1941年吴希庸曾对1929年关内各省流入东北的人口数量和所占比重进行过统计,统计结果为:山东籍流入东北人口总数为74.2万人,占当年流入东北人口总数的71%。此外,河北籍占17%,河南籍占11%,其他省份占1%^[11]。

(三)从流入东北人口去向上分析,流民大多进入东北北部。据满铁调查部统计,1923年~1927年由大连港上岸通过火车运往长春以北的关内人口占运送总数的56.7%;同期,由营口上岸通过火车运往长春以北的关内人口占运送总数的59.6%^[12]。另外,还有从山海关出关、经朝阳进入东北乘火车或步行前往吉、黑两省者。

民国时期关内人口大批涌向东北北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东北地方政府“移民实边”政策调控的结果;二是流民潮移密就疏的自然选择。东北南部较北部开发较早,人口密度高,荒地少,而东北

北部与此相反,地广人稀,因而成为流入人口的主要流向地。

(四)流入东北的人口基本上是难民。数量巨大的关内农民抛家离土“闯关东”,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清末民初,华北人口快速增长,致使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土地供养力严重不足,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除人口压力外,华北农民的经济压力也十分沉重。仅就田赋而言,山东省在张宗昌统治时期,“每亩田赋每年平均至少须缴大洋8元以上,以土地肥沃之区域,如鲁东之昌邑,经人研究每亩耕作之净利尚不及4元,所付田赋已超过农田净利1倍以上,而其他苛捐杂税尚未计及;是以有地之农民,反为土地所累。流亡逃散,铤而走险者颇多”^[13]。民国初年,华北地区各种灾害连绵不断。山东灾民1927年达2 000万人,1928年水灾、旱灾和蝗灾又波及82县^[14](P40,44)。与天灾并行的是战乱经年不已,华北地区从1916年到1930年,“军阀战乱没有一年休止。战争一次凶似一次,战场一次大似一次”。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北伐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主战场几乎都在直、鲁、豫三省。劫后余生者“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5]。

可见,进入东北的人口多为在家乡已经丧失土地的农民,因躲避天灾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灾民”,实际上都属于难民。流动的难民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唯一的组织形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关系或以地缘关系自发地结伴而行,彼此没有任何约束力,极其松散、随意;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区域,只知道“闯关东”,至于在“关东”的什么地方落脚,何处为生,根本没有计划。几乎所有的难民都没有到过东北,对东北几乎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东北地广人稀,有地可种。另外,到了东北的难民,所携带的“盘缠”也在路上消耗殆尽了,两手空空,没有金钱,没有农具,没有粮食,没有住处,除了一身力气,一无所有,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

巨量“流动人口”流向东北,在给东北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为社会治安、人口安置、生产规划、财政预算、行政管理带来一系列必须予以解决

资料来源:《东北年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口问题论文集》,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

的问题,东北地方政府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这即是“移民实边”政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日、俄移民侵略对东北安全的威胁

东北边疆危机是东北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状况,恰恰相反,北京政府尤其是东北地方政府很快便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危机之一便是日、俄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得中国东北南部之后,如何经营满洲——目标放在哪里,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式,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任职后,在《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中狂妄地宣称,满铁经营不出 10 年将向中国东北移民 50 万人。同时,他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递交了一份《满洲移民论》的备忘录,其中充分论证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重要性。后藤新平移民计划的目的:一方面,在满铁“附属地”形成日本移民集聚地区,然后扩展到中国东北的广大农村,以造成日本在中国人口扩张的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后藤新平认为,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虽败,但实力尚强。因此,日、俄两国间的战争“未必以满洲一战可以结束,第二次战争不知将在哪一年到来。如果胜利在握时,就先发制人;不能操胜,则以自重等待时机;即便开战亦不胜,我仍应留有善后余地。总之,我在满洲必须居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其得心应手之计,必当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兴办畜牧农业设备……其中必以移民为要务……我们倘在满洲拥有 50 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则进而作好入侵敌国的准备;于我不利,则岿然不动持和以待时机;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16](P31-33)

此后,后藤新平多次在讲演中强调,日本必须尽快“动员 50 乃至 100 万的日本人移到那里(指中国东北)去。不可忘记将来总有一天必定会发生归还满洲的事情。若要阻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就必须迅速地实现 50 万以上的移民。此事取得成功,必须采取的第二个手段就是争取日本人能够自由永久地借用或借贷土地”[17](P291),以造成日本人在中国长期定居的历史事实。即使有一天日本所拥有的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归还了中国,定居下来

的日本人也会仍然存在。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也强调指出,日本“迫切需要一批稳步扎根这块土地(指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这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18](P44)。很显然,日本策划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移民来壮大日本人在中国的实力,达到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并最终吞并中国东北的政治野心。

满铁从 1914 年开始,在守备队退役兵中陆续选拔人员作为移民对象。满铁为了保证“除队兵”移民者安心农事,扎根于中国东北,对退役兵移民实行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一是降低土地租金;二是贷款“给退役兵移民者 300 元以内的现金和现物,为其充当固定资本的购入费用”。三是对移民及其家属乘车实行价格优惠;四是允许同意移民的军人在其退役前的 2 个月~3 个月内,可以着军装办理租种耕地事宜,离队修建农舍、畜舍及其他建筑;五是派工兵帮助移民修建房舍;六是提供经营技术[19](P91)。

1910 年,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议会上提议 20 年内向满蒙移居大和民族 100 万人。此后,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数量逐年增加。1906 年,在中国东北的日侨不过 16 612 人,到 1930 年即增加到 233 749 人,增加了 14.07 倍。日俄战争以前,日本人只相当于在华外侨人数的不到 1/5,但到 1914 年日侨人数已和其他在华外侨的总数相等,在东北的日侨的比率在旅华日侨总数中约占 80%。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移民侵略政策所致。

表 2 满铁附属地人口增加情况表 单位:人

	1905 年	1910 年	1930 年
中国人	7 675	31 774	278 385
日本人	3 821	25 266	190 508
朝鲜人		384	31 415
其他国家		13	1 088
合计	11 496	57 437	501 396

资料来源:《满洲开发四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6 页。

上述数据表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移民速度。如果拿 1930 年的数字和 1905 年比较,中国人口在“满铁”附属地 25 年

间增加了 36.27 倍,而日本人则增加了 49.86 倍,日本的移民速度快于中国 13.59 倍。另外,日本除了向中国有计划地移居日本人外,还大量移居朝鲜人。自从日本吞并了朝鲜半岛后,朝鲜人即成了日本人。如将朝鲜人计算在内,日本在 25 年内向“满铁”附属地“共计移民达 221 923 人,是 1905 年的 58.08 倍,超过中国移民速度 21.81 倍。

根据各种资料统计,到 1931 年以前,日本向东北的移民(含韩民)超过了百万人,而且从上述移民分布看,遍布东北三省 30 多个市镇。有些市镇的移民数量虽然有限,但可从中看出日本的移民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并非盲目移入的“自发移民”,而是带有极强政府色彩的政治移民。

沙俄向中国东北移民早于日本,而且目的性十分明确,政策也更具体。民国时期,俄国向中国东北移民是其长期实行的远东移民政策的继续。“俄人之窥伺东北,远在明末,当神宗时,已远涉至鄂尔次克海。明世宗四十年,伊尔库斯克,阿尔巴金,布拉古岛金斯克,伯力等处,迭建名城。此后世为边患。康熙二十八年之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之恰克图条约,咸丰八年之璦琿条约,咸丰十年之北京条约,值次成立,从此益为多事。光绪二十二年喀西尼秘约,三十一年之朴茨茅斯条约告成,东北门户乃大开放”。

中东路开工是俄国向东北大批移民的开始,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这段时间里,沙俄不仅向中国东北的移民规模大、数量多,而且有组织、有计划。1898 年中东铁路全面开工后,大批俄国人开始涌入中国东北,增长极为迅速。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哈尔滨成为沙俄军队军用品供应基地,俄国移民人数因此激增,一度超过 10 万人。日俄战争结束后,大批俄国移民随军回国,俄国人数量锐减。不过,在当时来说,数量仍相当可观。据统计,1912 年哈尔滨市的总人口为 68 549 人,其中俄国人就有 43 091 人,占人口总数的 63.7%。此时,除哈尔滨外,中东路沿线各站都有俄国人移入。汤尔和在《黑龙江》一书中记载,1914 年呼兰附近有俄国移民 47 人,安达有 246 人,萨尔图有 30 人,喇嘛甸子

有 30 人,小河子有 44 人,烟筒屯有 25 人,满沟有 65 人,宋站有 28 人^[20](P163)。1917 年,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对中东路沿线俄国侨民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是:俄中侨民为 47 868 人,海拉尔 5 554 人,满洲里 3 257 人,横道河子 2 652 人,其余 36 405 人散布于中东铁路沿线。这时的俄国移民多为文职人员、铁路工程技术人员和商人,另有数百名俄国移民在海拉尔、结尔布尔勒和哈乌勒三河区从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21](P158)。

俄国移民不同于关内流入东北的难民,他们进入我国东北后都有固定工作,收入丰厚,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华人。“华工较之俄人做工速而且精”,工薪却“天地悬殊”。俄国移民之所以受到如此优待,主要是由于当时中东路铁路沿线的司法行政权、外人居住管理权、中东路的管理权都掌握在俄国政府手中。十月革命后,苏俄向东北黑龙江地区移民的数量有增无减,但这段时间里的移民特点较为复杂,移民目的、移民成分、移民组织也呈现出错综复杂之势。特别是 1920 年~1922 年西伯利亚的白匪政权被推翻后,大批沙俄时期的贵族、将军、地主、资本家、白俄上层人士、下级官兵以及自由职业者纷纷涌入东北北部。与此同时,由于西伯利亚地区连年饥荒,大批形形色色的俄国难民也潮水般进入黑龙江地区。关于苏俄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数字一直未见准确的统计资料,根据日人编辑的《满洲经济年报》统计,移居哈尔滨的俄人 1920 年达到 131 073 人,占哈尔滨人口总数的 45.8%。1922 年苏俄移民达到最高峰,达 155 402 人,1924 年为 58 559 人,1925 年为 92 852 人,1927 年为 55 959 人,1929 年为 57 114 人,1931 年为 62 114 人。据李德滨和石方所著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根据哈尔滨市俄国移民推算,全黑龙江地区的俄国移民最多时为 20 万~25 万人,当不为过^[22](P140)。

日本、沙俄和后来的苏俄为巩固其既得利益,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向中国东北实施有计划、有步骤的移民。日本以向东北南部移民为重点,俄国以哈尔滨为中心,对东北边疆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在外来压力之下,东北地方政府深刻地认识到移民

根据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改造社 1933 年日文版第 148 页)和[日]越泽明《哈尔滨的都市计划(1898~1945)》(总和社 1990 年日文版第 151 页)的统计数字计算出苏俄移民占哈尔滨市人口的比例。

的迫切性,为此而采取“移民实边”政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参考文献:

- [1]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 第1辑. 北京:三联书店,1957.
- [2][日]满史会. 满洲开发四十年[M].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3]郭宏德. 中国近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M].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 [4]邹枋. 中国田赋附加的种类[J]. 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号.
- [5]鲁灾民数百万将饿毙[N]. 大公报,1928-04-24.
- [6]王寅生. 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M]. 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
- [7]朱汉国,王印焕.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与社会变动[J]. 史学月刊,2001,(1).
- [8]狄璞若. 河北磁沟庄农村经济调查[J]. 中国经济,1937,5.
- [9]1927年之移民与东省铁路[J]. 东省经济月刊,第3卷第3号.
- [10]路遇. 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 [11]吴希庸. 近代东北移民史略[J]. 东北集刊,1941,(2).
- [12]满洲人口之流动[J]. 钱业月刊,第10卷,第7期.
- [13]吴至信. 中国农民离村问题[J]. 东方杂志,第4卷第15号.
- [14]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5]集成. 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J]. 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 [16]杨碧川. 后藤新平传·满洲经营篇[M]. (上). 台湾:桥出版社,1996.
- [17][日]铃木隆史.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M]. 吉林省伪皇宫陈列馆,译.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 [18][日]满洲拓植公社编印. 论满洲初期的开拓[M]. 1941.
- [19]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印.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档案资料选编)[M]. 1989.
- [20]汤尔和. 黑龙江[A]. 田方,陈一筠. 中国移民史略[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 [21]远东报[N]. 1917-04-20. 宋家泰. 东北九省[M]. 北京:中华书局,1948.
- [22]李德滨,石方. 黑龙江移民概要[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On the Local Northeast Government's Policy of Migration to Reinforce Frontier Defens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UI Li-bo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inside the Shanhaiguan Pass, the farmers' heavier burden,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and the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there arose the huge migration wave of people inside the Shanhaiguan Pass towards the Northeast. In the meantime, to occupy China, Japan and Russia also started the planned systematic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Faced with troubles at home and aggression from abroad, the local Northeast government adopted the policy of "migration to reinforce frontier defens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ce, historicity, progress and time in the given historical context.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cal Northeast government; refugees; Japanese and Russian immigrants

【责任编辑:孙 琰 责任校对:闻 文】